

# 美国首任CTO眼中的美国式创新

□安尼什·乔普拉

在美国,很多人都会得出“政府没用”这样的结论,主要依据是政府机构太臃肿、反应迟缓、效率低下而且无能。在联邦政府于2013年10月关闭之前,国会支持率就已经降到了骇人听闻的低位,使得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这位一直站在支持立场的人也说出了“我们现在只剩家人和领到薪水的员工了”这样的俏皮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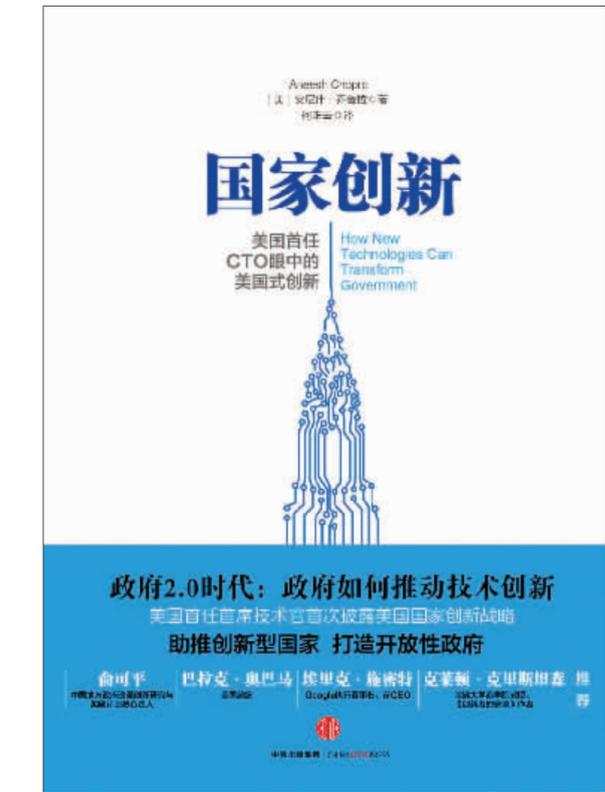
在出任总统助理和美国第一任首席技术官职务期间,我目睹的一些情况似乎更能够证实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这样的情况不是发生在政府外围机构的某些基层部门。在2009年的秋天,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就出现了这种麻烦。

从美国建国之日起,政府就承诺给予退伍军人应得的荣誉和支持,以感激他们做出的奉献。多年以来,政府主要通过授予荣誉证书和提供生活便利来兑现承诺。独立战争中的老兵不但得到了养老金,还获得了地方政府和州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障,其中一万多人还被赠予了公共土地,从普通士兵的100英亩到少将的1100英亩,一一不等。这种赠予一直持续到1812年的战争之后,这样的做法也契合当时的国家形象:独立、农耕及西部扩张。

漫长而血腥的南北战争导致对医疗卫生巨大需求。亚伯拉罕·林肯在其第二任期内呼吁国会“关怀那些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人,也关怀他们的遗孀和遗孤”之后,立法者们向他提交了《伤残志愿军人国家收容法》,林肯在遇刺身亡之前数周签发实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和随之而来的大萧条,引发了针对士兵报酬和福利的火药味十足的争议。1930年,胡佛总统下令建立了退伍军人管理局,另外在“补偿金远征军”进军华盛顿事件的两年之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新政”解决了大部分争议问题。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通过和退伍军人医保体系的完善,使老兵问题的解决看到了曙光。

新世纪里出现了新的战争形式。对那些从2011年9月11日起一直在服役的军人,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前海军部部长吉姆·韦伯酝酿并提出了《后“9·11”退伍军人教育援助法案(2008年)》。该法案为所有军人提供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广泛的教育福利,其中包括从该日起服役满3年的退伍军人负担4年制公立本科教育的全部费用等内容。

然而,与诸多出于良好意愿的努力一样,整件事从一开始就令人生疑。颁布时的种种错误,在践行时的多次延误中展露无遗。而且,与通常会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些问题被媒体盯上了。各种大标题旋即出现,如狂风暴雨般劈头盖脸而来。《纽约时报》上是“老兵说退伍军人法案资金被拖延”,《华盛顿邮报》上则是“尽管支票在手,退伍军人法案的福利也如过眼云烟”。报道中均提到了年轻退伍军人的沮丧:他们基于这些承诺做出了人生的重大



决策,但随后却发现,在订了宿舍、买了教材并选了课之后,却不能确切地知道这些开支中到底有多少可以用政府承诺过的福利来支付。这种拖延迫使一些人只能靠贷款维持学业、支付自己和家人的房租,确保自己下一顿有饭吃。

这些消息很快传入华盛顿,日理万机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拉姆·伊曼纽尔也备受其扰。这是我亲眼所见,因为我参与了每周日上午在罗斯福厅召开的高级幕僚会议。我与首席信息官维克·孔德劳以及首席绩效官杰夫·赞茨组成了一个三人小组,供职于奥巴马总统为履行其管理一个“有作为政府”的竞选承诺而创立的新部门。伊曼纽尔开玩笑地把我们称作“麦肯锡小子”,尽管我们谁也没有在咨询公司工作过。

在参与过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数不胜数的退伍军人看来,政府无所作为。伊曼纽尔设定了一个基线目标——“止血”。所以,我们在2009年10月9日一大早就起床,带着“数字止血带”,信心满满地登上一架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调来的军机,这架飞机用的是总统专机的机库。飞机降落在圣路易斯,我们一行人,包括退伍军人事务部的高级官员,走向退伍军人文件处理中心,去找出导致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一上午的闭门会议并没有让我们弄明白问题所在;当我们一头扎进主楼,看到处理这些事务的人员工作时,才恍然大悟。他们要检查资料,以确定

申请人是否有权享受某些福利以及能享受多少。但工作人员在审查、整合并处理所需信息时,需要经过多重步骤,并进行多次筛选。为了解决这两个基本问题,工作人员大概要从十几组不同数据库中提取所需要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库彼此间毫无关联,每份申请都需要人工复查多次,这就加大了工作量。因此,当将近28万名退伍军人在同一时期同时申请福利时,出现系统瘫痪和停滞不前就没什么好奇怪的。

没有简单的、一劳永逸的办法来全面应对退伍军人的那些需求,至少不可能很快拿出立竿见影的办法。然而,在返程飞行途中和随后的几天里,我们想出的一个干预办法成功减少了积压:该机构增加了数百名临时承包商,大家全力以赴共同应对当前的危机。白宫和退伍军人事务部又一起建立起了日报流程,将处理结果直接上报伊曼纽尔的办公室,目的是确保该机构能切实地负起责任。我们还批准了紧急预付款,以便在机构核查资料并整合需求时,退伍军人仍然能够继续自己的学业。

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只是尽己所能,就得到了令人相当满意的结果。2010年春,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发现,退伍军人事务管理局把原《后“9·11”士兵福利法案》申请的全国平均处理时间缩短了19天,附带申请时间缩短了23天。在被称为长期解决方案的新的自动处理程序全面应用之后,

学生在2013年春季学期延续福利的处理时间也许能够缩短到平均6个工作日。

这种情况代表了美国政府内部一个领域取得的显著进步。不过,这仍然只是一种东拼西凑,以及在低效率的程序中投入太多人力所得到的结果,还没有出现一个可靠、快速、有作为的政府。说真的,很长时间以来,这就是美国公共部门着手解决大多数问题的方式,它们通常都不太成功,也无法持续。

这就是我们的政府能做到的最好程度吗?美国那些最顶尖的首席执行官们当然不这么认为。这就是他们中会有50人同意接受奥巴马总统的邀请,出席2010年1月举办的“政府现代化论坛”开幕式的原因。论坛上,奥巴马总统要求他们加入。“我知道,你们在自己的行业和企业内大多遇到过这些挑战,其中有一些还相当尖锐,”总统告诉聚集在这里的专家们,“但我也知道你们是如何面对它们并战胜它们的:你们通过实验和创新,找出新的途径来提高生产率,更好地满足顾客的需求。今天我们之所以站在这里,是因为我相信你们的政府也应该做完全相同的事情。”

几乎没有谁会对这段煽情的演讲有异议。可以肯定,大多数公民并不觉得自己得到了好的服务。但是要怎么办?政府应该怎么做?又能怎么变?大众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首先要从大家共同改变讨论方式开始。这就意味着要停止关于政府管理范围和组织规模的无休止的争论,不理睬那些热情支持政府扩大者与毫不妥协地支持政府缩小者之间的争论,忽略那些制造矛盾和敌意且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的争议。我们要讨论的议题与政府应该更大还是更小无关,而应关注于政府如何才能更明智。

这里所讲的是打造一个“创新型国家”,一个面向21世纪的政府,一个能管理多元文化的社会,在解决问题时鼓励参与并建立伙伴关系。它也包含了推动创新氛围的含义,寻找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采用新的工具和技术,以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大的收益。

一个创新型国家应既关注公共利益也关注个人利益,向公众公开政府的数据,并鼓励大家运用这些数据;鼓励私营部门积极采用那些能让自己参与到更大规模竞争的标准,尤其是在受监管的经济领域;通过奖励和挑战的方式为结果买单,而不是通过采购程序为承诺买单;通过吸引并留住顶尖人才,让政府里的人学会企业家思维。

让美国再次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一个更明智的国家,就是本书的目的所在。本书是为那些厌恶了有关预算案和政治立场的争吵但仍对服务大众的精神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可能性深信不疑的政府公务员而作;为那些因官僚主义而对政府敬而远之但依然相信自己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的企业家而作;它更是为那些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对政府的信心但依然相信政府代表正义力量的人们而作。

■ 新书快递

商品交易之王



作者:(美)凯特·凯利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

商品交易者是一群精明能干、百折不挠的精英。他们灵活运用大量资金和各类技巧在众多商品合约中游走交易,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因此,作者半开玩笑地称其为“掌控世界的秘密俱乐部”。

当提及变幻莫测的全球金融市场,大多数人想到的是股票、债券、风险投资、高科技IPO、复合抵押担保证券等金融产品。至于商品,原油和豆类?铜和小麦?听起来似乎乏善可陈。而这正是那些商品交易精英希望看到的。他们既不追求曝光率,也不愿意像沃伦·巴菲特或比尔·格罗斯那样声名显赫。他们选择独立开家小公司或是隐藏在大型银行和金融机构背后,默默地通过商品交易创造巨额财富,无论盈亏都不声张。

然而,当大宗商品超级周期来临之时,尽管这些交易商的个人生活极其低调,他们带来的巨大影响却再也无法被忽视。近年来,商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原材料价格一路上涨,同时也带来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些举足轻重的交易商们是否涉嫌故意抬高了全球范围内的燃油、食品以及其他日用品必需品的价格?导致商品价格攀升的背后推手到底是什么?尤其是当2000年大宗商品超级周期来临之时,大型银行和金融机构带来的巨大影响无法再被忽视。作者凯特·凯利将目光集中在了金融史上最非凡的一段时期,生动地描述了这一时期对冲基金、银行、经纪商、监管者等各个市场参与者的不同分工和角色。

作者简介:

凯特·凯利,纽约时报畅销书《华尔街之战》作者,CNBC驻华尔街资深记者。凯利曾在《华尔街日报》工作十年,曾深度报道高盛、摩根士丹利、纽交所等金融机构。

野蛮大陆



作者:基思·罗威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内容简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留下一片混乱。地形地貌被彻底改变,许多城市被夷为平地,数千万人惨遭屠戮。在欧洲大陆绝大多数地方,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机构——警察、传媒、交通、地方政府和全国政府——要么付之阙如,要么破败不堪。罪恶横行,经济崩溃,欧洲人挣扎在饥饿边缘。

在这部研究战后初年历史的开创性著作中,基思·罗威描绘了一片仍然被暴力缠绕的大陆,在那里,有相当部分民众仍未相信战争已经结束。他勾勒了长期冲突的后遗症,以及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他还描绘了重新建立的世界秩序,最终为这片支离破碎的大陆带来稳定。

作者简介:

基思·罗威,全职作家和历史学家,曾做过十余年的历史类图书出版商。他被公认为二战史权威,经常在英国和美国的电视广播上发表意见。广受赞誉的历史著作《烈焰地狱:1943年汉堡灭顶之灾》即出自他之手。

战争



作者:伊恩·莫里斯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内容简介:

几万年來,战争一直被视作人类最大的梦魇,但在这本罕见地融合了客观的学术研究和惊人的智慧的书,《西方将主宰多久》的作者伊恩·莫里斯进行了颠覆性的思考,他向我们展示了令人不快但又无法否认的事实:从长期来看,尽管战争带来了杀戮和血腥,却使人类更安全、更富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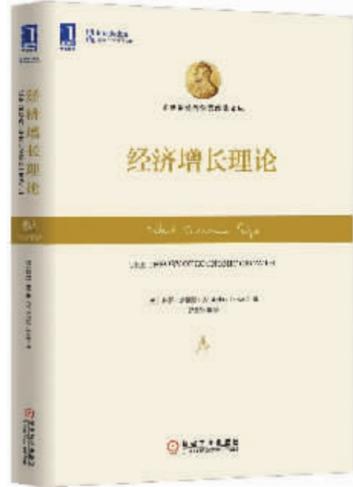
这本书涵盖了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进化生物学,以及科技和军事知识,讲述了令人毛骨悚然却又引人入胜的战争故事,历数从类人猿到机器人的15000年的争斗和暴力,从原始社会到古代文明,再到“美利坚帝国”。莫里斯犀利地指出在石器时代,人们生活在争斗不休的小社会中,有1/10甚至1/5的可能会死于暴力。与之相反,在20世纪,尽管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等大小战乱,每100个人却只有不到1个人死于暴力。这都是因为战争,也只有战争打造出的利维坦式的大型中央集权国家,才能够确保稳定,从而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富裕。

这本书对15000年人类战争史的研究更表明,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时期。如果我们可以度过这一阶段,那么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终结战争的梦想或许就可以实现。但莫里斯认为,要想知道战争接下来会把我们带向何方,必须先明了战争究竟意味着什么。

作者简介:

伊恩·莫里斯,全球著名历史学家、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和古典文学教授,已出版《西方将主宰多久》《文明的度量》等多部著作,得到学术界和读者的一致好评。

## 国家经济起飞理论的开拓者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作者:(英)阿瑟·刘易斯  
书名:《经济增长理论》

他论述经济发展的专著相比,本书在理论架构、研究内容和写作风格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性。首先是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作者秉承的是自亚当·斯密以来伟大经济论著的传统,即全面系统地阐述落后经济体发展的动力、条件和过程,而非专注于某一特定的领域或行业,试图提供一份对学习、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都有指导意义的地图册。

作者论述的起点是个体的行为、观念和意愿,只有当人们传统的观念发生改变,具有致富的意愿时,个体经济行为才有可能发生改变,原本停滞的经济才会起飞。而对此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社会制度,取决于制度能否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各种经济活动提供适当的激励和约束。恰当的行为和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为基本和关键的因素。然后作者分别讨论了影响经济增长的三个直接因素,即知识、资本和资源。落后国家可以利用自身的后发优势,学习和引进先进工业化国家的技术,但应注意由资源禀赋的差异所产生的技术适用性问题。资本是古典理论中决定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经济起飞的过程就是落后国家将储蓄率由5%提升至12%,甚至更高水平的过程。包括人口在内的自然资源,当然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人口数量和自然资源丰缺一不一的国家,都有可能实现增长。过多的人口和自然资源的匮乏,并不必然会导致经济停滞。作者最后论述了不同的政府形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强调了政府在增长过程中必须发挥的关键作用,但是,也指出政府经常成为经济停滞和衰退的根源。

其次,本书的研究方法也有鲜明的特点。一是结合逻辑演绎和经验归纳。作者在构建经济发展理论的过程中,有着清晰的逻辑脉络,虽然没有使用数理方法,但以清

询。出生和成长于英属殖民地的特殊生活经历,数十年在发达国家著名学府学习、教学和研究的经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积累的丰富阅历,使刘易斯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既能高屋建瓴,几乎凭一己之力建立早期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框架,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又能对落后国家遭遇的困难感同身受,在研究中倾注了满腔热情和深厚情感。时至今日,刘易斯开创和发展的二元经济模型和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仍是理解落后国家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主要范式。

1955年首次出版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刘易斯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其目的在于提出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以阐释发展中国家民众陷于贫困的原因,发展中可能遇到的主要困难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法。与其

□郭金兴

截至2014年,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最高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共颁发了46届,获奖者遍及全球,其中,阿瑟·刘易斯是第一位,也是迄今唯一一位黑人经济学家。也许,这就是对其研究取向、方法和特点的最好注脚,同时,这也与其特殊的生活与工作的经历息息相关。刘易斯1915年出生于英属西印度群岛,成年以后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SE)接受教育,获得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先后在伦敦经济学院、曼彻斯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职。除此之外,他还曾经出任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经济顾问、西印度大学校长、加勒比发展银行的总裁,并为亚洲和非洲等众多发展中国家提供咨